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的，它的出现一定有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有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又决定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邓小平理论以及构成这一理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它能够指导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是因为它适应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五大的科学论断说明了形成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当代，即有着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时代背景；二是中国，即是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践需要；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这一理论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一 时代主题的转变要求新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毛泽东思想同列宁主义一样，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思想则是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和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科学地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后指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及其历史地位 指出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列宁发现并论证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列宁胜利地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世界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缺口，而且也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根基，开辟了社会主义世界革

命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地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这个历史任务，长期艰苦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这两大任务的正确道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首先突出地表现为他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发生在改变了世界历史方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崩溃，而在其余的地方又充分暴露其腐朽性的时候，中国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根据中国的

具体国情，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一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关于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依据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占有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一次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提出和实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经济和民主改革，1953 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别实行了无偿剥夺和和平赎买的不同政策。而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时候，又采取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

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也采取了通过各种过渡的形式和步骤逐步改造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合作社的思想。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大革命那样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是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和中国不仅是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且是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长时期内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颠覆的威胁。在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不到 10 年时间，就发生了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国际上反共反华势力猖獗，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我们处在隔绝、孤立状态，而且多次发生过边界武装冲突，这就不能不产生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想法。如何摆脱这种严峻的被动局面，当时普遍的想法是除了依靠自身的发展外，最终要靠世界革命的胜利。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总是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看成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动力和工具，看做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因此，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建设经常是同推进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前工业化水平不高，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后经济底子薄弱、国力不强的条件下要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建设自然要实行赶超战略。而要实行赶超战略，就不能采取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过的从轻工业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办法，于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的方针就提出来了，并被斯大林在理论上定义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而在经济力量薄弱的条件下要建设耗资巨大而建设周期较长的重工业，必须尽可能集中国家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于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分配资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提出来了，并且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的对立物，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的特征。而要能够顺利地推行这些方针，自然要尽量使公有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得到发展，因而国家所有制自然成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只有公有制条件下，特别在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尽量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经济基础。这样就产生了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在现实中探索实现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的伟大尝试。今天看来这一新社会的模式，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许多方面没有能够真正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它的诞生不仅震撼了资本主义旧世界，使世界无产阶级看到了希望，而且在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出了骄人的业绩。30年代当资本主义世界被世界性的大危机所困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1928—1940年，由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不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而且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原来远远高于革命前俄国的英、法、德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工业大国。社会主义的苏联仅仅用了 13 年的时间 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程。正是由于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苏联得以有经济实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不仅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而且成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力军。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其诞生后迅速显示出了优越性，因此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仅没有适应时代的发展得到改革和完善，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竞相仿效而被看做是社会主义惟一正确的模式。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虽然有我们自己的某些特点，但就整体上说实行的还是苏联模式。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20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渡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危机和动乱的年代，吸取了教训并学习了社会主义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做法，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逐渐解体，而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后迫切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解放和发展，这些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随着美苏关系缓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威胁减弱，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经济发展问题的矛盾逐渐加剧。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不复存在。虽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因而世界并不太平；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总的趋势是从战争和对抗走向和平和发展，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避免世界大战，争取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由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使社会生产

力发展速度空前加快，并且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都使中国加速发展变得更加迫切。列宁在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条件下，提出过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口号。而今天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加深和加强了各国的经济联系。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使各国之间在市场、资源、资金方面既需要增加合作，又加强了摩擦和竞争，使经济问题上升到首位。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趋势既提供了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有利条件，又面临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严重任务。如何适应这种趋势，参加进去并掌握主动权，兴利除弊，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课题。如果说当年苏联曾经利用 30 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而加速实现了自身的工业化，而后来又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及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而走向衰落，那么对当代中国来说，更应重视这一新的机遇和挑战，找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正确方针。

邓小平在认真观察和分析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①他认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我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断及据此调整对外政策的两大变化，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世界无大战、周边无敌国的有利形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临的形势和条件显然不同于 30 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长期以来期望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较长时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已经赢得，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苏联模式的弊端却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不仅跟不上新的科技革命的步伐，而且经济增长率也明显下降。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邓小平理论和他的经济思想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回答了时代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步富裕，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

明前景^①

二 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比不上当年的俄国。在这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

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的课题。5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从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二十多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一直在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种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50年代中期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虽然存在有要求过急的偏向，但整体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和成功范例。但从经济政治体制来看，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说仍是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尽管在实践中我国也有某些自己的特点，但从所有制结构到经济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再到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基本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排斥市场经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等等，基本上没有跳出苏

^①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联模式的窠臼。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对发展经济和人民生活，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不改革无法克服的弊端，同时也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因而不能使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50年代中期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弊端开始比较明显地显示出来，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指名批判斯大林以后，解除了思想禁锢，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惟一真理，这进一步促进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不能不成为毛泽东迫切关注的问题。对于当时那种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毛泽东并不满意。他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好了。

1956年春，为了总结经验，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用几十天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即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这个基本方针，一方

面是总结了我国的经验，研究了我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鉴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讲话提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不能学他们的短处、缺点。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根本指导思想。

根据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当时的历史实践和经验，从《论十大关系》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方针，开展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方面的探索。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有积极的成果，也走过弯路。就其主要成果来说，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理论。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他特别提出了要区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并且把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这些科学的论述

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述。在早期的探索中，毛泽东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就是建立在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党的八大更是明确地指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更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以后，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所以要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着眼点也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 发展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们的文化。尽管这种正确的认识后来没有能够得到坚持和进一步的发展，但这种探索的成果对后来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毕竟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曾经十分谨慎地断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认为我们还需要经过多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而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一分析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述。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

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实际出发，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要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设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根据当时的经验，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倾向，要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注意解决职工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明确指出，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在所有制结构上，1956年底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个体户明显增加，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以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现象，毛泽东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他还提出过要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虽然后来这些思想没有得到实现，甚至在一个时期内还被大加批判，但应当说，提出这些想法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些重要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关于对外开放方面。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他认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

想作风，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认为像中国和苏联这类国家，进行建设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 不做生意 而是需要联系 需要做生意 不要孤立。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国在 70 年代初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拓宽了对外关系，成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先声。

但是，当时我们党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还来不及做出科学的分析，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还知之不多不深，因此许多正确的思想不仅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而且也没有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后来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在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这种探索也就因为失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而迷失了方向，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丝毫有益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经过多次正面和反面的教育，才能够完成。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也是这样。60 年代初毛泽东曾经说过：“对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①他还说过：“对于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了解 但有些不甚了解。”搞社会主义 我们没有一套 没有把握。”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虽然如此 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早期探索仍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有益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 827、829 页。

成果和反面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都对后来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薄一波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概括为始于毛，成于邓。这是很有见地的。

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要求，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从总体上说，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上，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而能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能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国情，恰恰是能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能不能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因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节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

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以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而它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 1975 年的整顿。在 1982 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已经产生。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源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的反思。这种反思首先集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集中表现在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意义，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修正主义，大批特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要彻底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确立起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路线。

应当说这种反思在 1975 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领导的全国性整顿工作中已经开始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当然不可能完全否定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在要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经济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①“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才行。”^②“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 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8 页。